

Books Review  
Books Review  
Books Review

經典導讀

Books Review



# 介紹一本 值得閱讀的好書

## 《近世中國學術通變論叢》

Commending an admirable book  
—Intellectual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ecent China



《近世中國學術通變論叢》

嚴壽澂 著

國立編譯館 出版

華泰文化事業 總經銷

民國92年3月

ISBN 957-01-3690-1

夏長樸

國立臺灣大學

《近世中國學術通變論叢》是一部相當用心的著作。作者之所以將探索對象定為「近世中國」，主要是有鑑於百餘年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鴉片戰爭失敗、中國門戶洞開，西方文化的不斷衝擊之下，不僅本身的文化自主意識消失殆盡，甚至在從事中國學術研究工作時，自信心也嚴重不足。影響所及，本身失去主體意識，完全以西方的理論觀念

為自己的理論觀念，絲毫未顧及中西文化有其基本差異存在。於是在從事研究工作時，胡亂套用西方觀念，未經嚴格檢驗即奉西方理論為金科玉律，任意加以比附。類此「不通家法」<sup>1</sup>、「以理限事」<sup>2</sup>的現象，正是近代中國學術研究的最大通病。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大陸學界完全以歷史唯物史觀解釋中國學術思想，臺灣某些學術著作任意套用西洋流行理論的現象，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有鑑於上述弊病，作者認為，在西力東侵以前，中國學術雖有變化，基本上並未與前此傳統有所割裂。因此，與其勉強套用西方理論來詮釋中國學術，造成種種流弊，不如反求諸己，從傳統文化

夏長樸，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通訊作者：夏長樸，106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E-mail:cphsia@ntu.edu.tw

中尋找合適的概念，用以說明中國傳統的學術與思想變遷。本書以近世中國學術為研究主題，刻意強調「通變」，並且以此命篇，基本理由在此。此處所謂的「通變」一辭是有所本的，《周易·繫辭上傳》曰：「通變之謂事。」作者本此而說：「傳統中國的學術，傳承不絕，並無文化上的大革命，此即『通』。然而這繩繩相繼的『通』，正是由『變』而來；通以變成，故能傳之久遠。」<sup>3</sup>。這個說明簡單扼要，卻具體傳神的將作者撰寫此書的旨趣闡述得相當清楚。

就本書的結構而言，由於這本書的性質是論文集，並非刻意成書，因此作者在結集出版時，基本上依照各篇討論對象時代的先後以及論述的內容，大致做了一個分類，以便有所區隔。雖說如此，全書各部份的安排，在內容上其實是脈絡分明，聲氣相通的，試一誦讀，便可知曉。除「敘論」外，全書分「本論」、「廣論」及「附錄」三部份。「敘論」不僅開宗明義，說明本書撰著的旨趣，其實更是全書的重心所在，建議讀者在通讀全書之前，應該先細閱這一部分，以便了解作者的用心。

在「敘論」中，作者明確指出：「在近代知識階層中堅眼中，中國以往的歷史，實在是漆黑一團，乏善可陳。然而在民族主義情緒驅使之下，這些知識分子又不能，或不願對吾族先民的一切全盤否定：不少事物，西方有的，我們其實也有，祇

是發達程度不夠、尚在萌芽狀態，或是原先已有相當進展，後來不幸夭折，或是始終存在、可惜未受後人充分注意與適當評價。」由於這種心態作祟，近代知識分子在論述學術時出現兩種特徵：「一是視世界歷史的發展為一元，二是以近世西方的價值為準繩。」<sup>4</sup>，對這兩種現象的存在，作者頗不以為然，分別以伯林（Isaiah Berlin）及余英時的相關著述為據，對兩種病徵做了要言不煩的批駁<sup>5</sup>。在破除錯誤的觀念之外，相應於此，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西力東侵以前，中國學術縱有萬變，似乎從未與前此的傳統割裂」<sup>6</sup>，基於這個前提，作者提出了他的「通變」論，用來作為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基本觀點，這是本書的基礎，值得特別注意。

「本論」是本書的核心，主要探討明末清初以迄民國早期的學術人物，包括《思問錄》與船山思想、莊子、重玄與相天——王船山宗教信仰述論、近代實用型儒家循吏之學——袁簡齋論治發微、嘉道以降漢學家思想轉變一例——讀丁晏《頤志齋文集》、此意深微俟知者——呂誠之先生史識述論及讀《陳寅恪文集》札記（四篇）等六篇論文，分別論述了清初的王夫之、乾嘉時期的袁枚、嘉道之間的丁晏以及民國的兩位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與呂思勉。在探討對象的設定上，清初的王夫之，民國的陳寅恪、呂思勉，都是具有

<sup>1</sup> 所謂「不通家法」一語出自陳寅恪的一幅對聯：「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見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63），作者藉此語批評某些中國學者的著作任意套用西洋理論或新名詞，其實卻是「缺乏依據，不合原文脈絡」。參見原書 敘論，頁17，註9

<sup>2</sup> 「以理限事」本之於王夫之所說的「立理以限事」，作者藉此語說明現代某些學者論述中常有「強解事實以遷就某理論」的現象，參見原書 敘論，頁11。

<sup>3</sup> 參見原書 敘論，頁12

<sup>4</sup> 以上引文見原書 敘論，頁5-6。

<sup>5</sup> 參見 敘論，頁7-8及頁11-12。

<sup>6</sup> 參見 敘論，頁12。

代表性的學者，乾嘉時期不選擇漢學名家而選了以文學著名的袁枚，嘉道之際未選龔自珍、魏源而選知名度遠在兩人之下的丁晏，都是相當特別的安排。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重要學者，生前雖聲光俱晦，同治、光緒之際，卻被肯定為清初三大儒之一，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足見其學問造詣深受後人肯定。作者本身為研究王夫之的專家<sup>7</sup>，有鑑於近代以來，研究王夫之的著作雖多，誤解也最多，為了要導正誤解，彰顯王夫之哲學的本義，於是繼博士論文之後，分別撰寫了收進本書的《思問錄》與船山思想、莊子、重玄與相天——王船山宗教信仰述論 兩篇論文。作者認為近人在研究王夫之時，完全忽略了「船山秉承宋明儒學的大傳統，所關切的，乃是如何做工夫、如何理解理氣關係等理學內部問題」<sup>8</sup>，因此從「唯物與唯心之辨」、「啟蒙與封建之爭」方面討論王夫之的思想，這是一個錯誤的作法，上述兩篇有關王夫之的論文，就是為了糾正這種錯誤的觀點而作。細心的讀者在閱讀這兩篇文章時，會發現作者不僅嫻熟王夫之的思想，同時在宋明理學與佛學、道家上，都有深入的造詣，所以在處理相關的問題上，有舉重若輕的功力，若沒有長期浸潤沈潛於古籍的經驗，是不可能有此表現的。

近代實用型儒家循吏之學——袁簡齋論治發微 是一篇辨正曲說的力作，值得一讀。近年來中國大陸學者在研究中國思想史時，提出所謂「實學

思潮」的觀點，代表作品是《明清實學思潮史》，這部書是集體合作的論著，其中也收入了袁枚這位文學作家，這當然是饒富趣味的作法，頗值深思。執筆者刻意在該篇篇題上標榜「袁枚的『抒寫性靈』說及其叛逆精神」<sup>9</sup>，足見袁枚之所以收入該書，就是因為「抒寫性靈」的文學主張與「叛逆精神」這兩個特色。姑且不論清代是否有所謂「實學思潮」這一回事，將「抒寫性靈」與「叛逆精神」與「實」這個字放在一起，就是頗令人訝異的作法。本書作者對這種違背常理的作法頗不以為然，他認為袁枚這位文學家不是沒有實學，「不過，此『實』乃往日士大夫心目中『經濟實學』之『實』，而非今世學者所發明的『實學思潮』之『實』；其內容在於論為政、論吏治，而不在『抒寫性靈』的文學主張；其精神在於切實際、便實用，而不在所謂『叛逆』」<sup>10</sup>。因此，作者以袁枚為研究對象，就其仕宦的吏治表現及其論治的獨到見解，做了一番闡幽發微的工作，也揭開了以文學著稱的袁枚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對研究袁枚其人而言，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嘉道以降漢學家思想轉變一例——讀丁晏《頤志齋文集》，討論的雖是丁晏這位學者，主要思考的卻是乾嘉漢學盛極而衰的過程中，身歷其境的學者在大環境急遽變化下，如何因應調整的根本問題。作者認為：丁晏生當乾隆末年至光緒初年之間，一生歲月與漢宋調和的學風相終始，「漢學家思想的轉變，以及學術標準（訓詁通經）與致用目

<sup>7</sup> 本書作者為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博士，其博士論文“Coherence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Worldview of Wang Fuzhi (1619-1692)” (Ph.d. thesis, Indiana University, 1994) 即是研究王夫之的專著。

<sup>8</sup> 《思問錄》與船山思想，詳原書頁25。

<sup>9</sup> 陳鼓應、辛冠潔、葛榮晉：《明清實學思潮史》（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下卷，頁1531-1560。

<sup>10</sup> 近代實用型儒家循吏之學——袁簡齋論治發微，原書頁101。



的（明道救世）之間的弔詭，可說具見於柘唐（丁晏字）之身。」<sup>11</sup>。通過對丁晏《頤志齋文集》的深入考察，作者清晰的說明了丁晏這位原本以漢學名家的學者，如何「棄漢反宋，由宋入明」<sup>12</sup>，最終走向王陽明心學的思想轉變過程。其中最具影響力的關鍵因素，就在於世變的刺激。丁晏雖然不是非常知名的大學者，但適逢其時，思想上也恰如其分的做了調整，這是學術與世變互動的最好例證。作者在選題與論證上，都充分彰顯了此一主題，具有相當不錯的學術史意義。

此意深微俟知者——呂誠之先生史識述論主要在闡述現代史學家呂思勉的史學成就。呂思勉治學嚴謹，著述宏富，在同時代歷史學者中罕有其匹，民國十二年出版的《白話本國史》（商務），對當時的歷史學界與文化教育界曾造成相當大的影響。此後又陸續完成許多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晚年所寫的《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以上皆開明書店本）與《隋唐五代史》等四部斷代史，雖未能及身完成規劃寫作的《宋遼金元史》、《明清史》二書，但已奠定其在現代史學界的崇高地位<sup>13</sup>。作者鑑於呂氏治史沈潛篤實，「融會貫通，用意深遠，不立門戶，不求媚俗」<sup>14</sup>，卓然自成一家，因此撰成此文，用以表彰先賢，從而發潛德之幽光。全文強調呂氏為學的祈嚮有四，一是嚴義利之辨，二是經世致用，三是規模廣大，四是頭腦冷靜。簡而言之，就是史德與史識相輔相成。以此為基礎，開展出完整的治史方法與具體的史學論述，成就了其一生的治學志業。這是有關呂

思勉學術的深入探討，詳盡嚴謹，頗可誦讀。

「本論」所收的四篇讀《陳寅恪文集》札記，分別就陳寅恪思想中的「少喜臨川之新，老同涑水之迂」、「招魂楚澤，續命河汾」、「新儒學、新宋學與中體西用」以及「論道德與禮法習俗」等重要觀念，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雖曰「札記」，其實是相當重要的理念分析，不枝不蔓，就事論事，對理解陳寅恪思想而言，是頗有價值的參考意見。

「廣論」部份三篇中，雖也涉及到兩位學者——劉咸炘與袁枚，但重點在所討論的問題而非人物，論述簡而不煩，性質與「本論」各篇稍有差異，因此未收入「本論」而另立「廣論」一類，這種處理方式考慮周詳，也有所區隔。宋明儒學發展的「內在理路」——劉咸炘「三進」說評述一文，是作者借用余英時先生的「內在理路」說這個概念，針對民國學者劉咸炘就宋明儒學發展提出的「三進」說，所作的專論。何謂「三進」？用劉咸炘自己的言語來說明，就是：

漢以後儒者之學凡三變。漢唐儒者止於粗跡，至宋始知反本，而兼取老莊、佛氏。至明，更求靜處之實得而通丹家，合三教。皆求之愈切，入之愈深，每變而益進者也。然宋儒於二氏，陰取陽排，雖取老莊，亦固謂與丹道無關。儒者又自相訐，其略於內者，則以重內為近禪。至明以後，乃復漢唐之舊，逐末忘本，限儒學於小德細行、文章制度，甚且諱言靜，諱言心，舉昔之積力累勞、幾將究極者，翫然置之，反以為不足道，是可怪也<sup>15</sup>。

<sup>11</sup> 嘉道以降漢學家思想轉變一例——讀丁晏《頤志齋文集》，原書頁163。

<sup>12</sup> 同上，頁170。

<sup>13</sup> 以上參閱《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說明。

<sup>14</sup> 此意深微俟知者——呂誠之先生史識述論，原書頁193。

<sup>15</sup> 劉咸炘：「三進」，收在《推十書·內書》（成都：成都古籍書店影印，1996年），卷4下，總頁517-526。

根據作者的詮釋，這就是「鑑泉（劉氏字）心目中宋明儒學發展的『內在理路』」<sup>16</sup>。這個不同於余氏說法的提出並非偶然，作者有其理由，他認為余英時所揭櫫的「內在理路」說固然有其價值，所舉出的考證學自明末即已興起，也是歷史事實。但余先生將考證學興起的成因解釋為由於「尊德性」與「道問學」二種學派爭持不下，因而競相「取證於經書」的結果，作者則頗不以為然。作者指出，余先生說法的最大問題，在於「混淆了『德行』『文學』的不同界域。」由於有此誤解，導致他的理論在解說上的不夠圓融。為了彌補這個缺陷，因此作者提出沈埋已久的劉咸炘的「三進」說，做為「內在理路」說的另一個答案。作者強調劉氏的說法，「既能說明這一方面的『內在理路』，又能解釋明儒心學、氣學兩派同趨於取丹道、合三教的事實。」<sup>17</sup>。可見這篇文章除了表彰久已為人遺忘的劉咸炘的學術之外，也對當代甚為流行的余氏說法提出相當明確的質疑。至於其是非究竟如何，則有待於學界的論斷了。「廣論」所收的另一篇文章「文字獄與思想改造——從袁枚說起」，是典型的藉古諷今文章，作者認為袁枚身處文字獄盛行的時代，猶能優游林下，甚至放言無忌，不憂飛來橫禍，原因無他，在其治生有術，經濟獨立，不受官方的拘束。作者明言，袁枚的時代，雖有文字獄，只要經濟自給自足，仍有此身自由的可能。若是處於官方控制一切的「新中國」，知識分子若拒絕政府的改造，只有死路一條，更別說優游林下、逍遙自在了。作者有身歷其境的背景，又有留學美洲的經歷，兩相對照，感慨極深，無怪乎憤懣之情會溢於言表，進而發諸文字了。

「附錄」所收的「百年中國回顧——革命、意識形態與現代化」一文，是作者針對百年來現實政治與意識形態糾纏不已而做的沈痛檢討與反省，寓意深遠，亦有見解。由於內容及份量與本書所收專論學術各篇頗有距離，性質也有頗大差異，為了與「本論」、「廣論」部份有所區隔，作者在慎重考慮之後，另立「附錄」一類，這種安排是合理的。

通讀全書之後，可以看出作者在撰寫這些論文時十分用心，這種認真的寫作表現，恰如其分的反映出作者治學上的謹慎態度。必須要指出的是，可能因為作者研究領域兼跨學術思想史與古典文學的關係，在需要講究理性的學術論述中，有時不知不覺的就將個人的感觸流露在字裡行間，形成一種不太協調的現象。例如「此意深微俟知者——呂誠之先生史識述論」末段內文中插入「今日改革開放之時，貪官污吏，國庫蛀蟲，對於其家人親戚，往往頗有仁者之風。歷來的貪官污吏，大多亦是如此。」<sup>18</sup>，類此字句夾雜在嚴肅的說理文字中，頗有突兀之感，也破壞了論文論述的一致性，這種文字在其他各篇也偶而出現，細加翻檢，即可發現。筆者認為，其實這是不必要而且可以避免的瑕疵，在此提出，以供作者他日修訂時的一個參考。

本書作者學有專精，本書各篇見解亦有獨到之處，就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研究而言，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值得推薦給愛書而且喜歡讀書的人。

初稿收件：民國92年9月20日

完成修正：民國92年10月23日

正式接受：民國92年10月24日

<sup>16</sup> 宋明儒學發展的「內在理路」——劉咸炘「三進」說評述，原書頁292。

<sup>17</sup> 括弧內引文，俱見於原書頁298。

<sup>18</sup> 見原書頁226。